
浙学及周边： 由传统浙学而现代浙学的不同观照

钱茂伟 施琪航¹

【摘要】：浙学是一个历史性嬗变的概念。传统的浙学，实际上是学问之学；今日所谓浙学，实际上是学科之学。就浙学史研究来看，20世纪以前的浙学称为“传统浙学”，20世纪以后称为“现代浙学”。由此，观照浙学与周边关系的方式也不同。简单地说，传统浙学是儒学类型之间的联系。20世纪以来，则是现代中国学术之间的联系。由浙江籍史家董朴垞的学术经历，可以一窥现代浙学研究的面貌。只有活跃于全国性学术舞台，才能成为高水平的学人。

【关键词】：传统浙学 现代浙学 董朴垞

基金项目：2018年度宁波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“阳明心学与浙东文化研究”（YMXW18-6）阶段成果。

浙学，是一个历史性嬗变的概念。很长时间，无法说清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之分。现在看来，前者是学问之学，后者是学科之学。就浙学历程及其类型来看，以20世纪为界，至少可分为前后两段，20世纪以前为“传统浙学”，20世纪以后为“现代浙学”。有鉴于此，何谓浙学，浙学及周边的研究，拟分为传统浙学与现代浙学两大阶段来思考。

一、传统浙学：由学问之学而学科之学

1. 浙学即浙东之学

自秦汉以后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国家，儒学是主导性学术，所以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是儒学。全国各地的学人，进入统一的学术文化圈，其治学大范围不出儒学。所不同的是，全国各地的学人表现不同、成绩不同、特点不同而已。中国是一个超大型文明国家，各地接受儒学的程度与反映不同，会有地域化的差别现象。由于空间不同，各地学人在理解儒学时，会有不同的地域色彩，这就是儒学的地域化。传统浙学，要从儒学的传播入手来思考。儒学向南方传播，进入浙江区域，形成浙学。浙学，当然也是全国之学、时代之学，不是什么独门工夫，只是有浙江特色而已，可称为“浙地儒学”。

早在南宋时代，朱熹就提炼出“浙学”一词，并被元代的学者所沿用。此处的“浙”，是“两浙路”的简称，“学”则是指儒学。所以，当时所谓“浙学”，本质应是“浙江儒学”，浙学就是浙江儒学。¹不过，考察浙江省概念的形成过程，这个解释是要修正的。在唐宋“道”、“路”时代，浙江分属两大行政区，是两地人。浙，作为空间概念仅是范围，我们的关注重点显然是学人。人是学术的主体，主体是浙籍学人，是浙地学人群体成果研究。就学术来看，浙人当然是浙籍学人。浙学是一个学术概念，是优秀浙江学人之学。浙学，相当浙籍学术团队，浙学是浙江学人做出的学问体系。南宋以后，南方是儒学发展的中心，所以南方儒学地域化更明显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浙江学人的表现十分优秀，于是浙学受人重视。南宋时代，浙西路学术不发达，只有浙东路学术发达，所以，朱熹所指的“浙学”是浙东之学，故有时也称为“浙中”，具体地说，就是吕祖谦、陈亮、叶适诸学。元以后，才进入实体的行省时代。当时江浙合一，称为江浙行省。明以后，进入统一的浙江布政使司，不再划分为东西两大块。清以后，正式称为浙江省。明朝人将本朝的王阳明之学称为“浙宗”或“浙学”，仍是浙东之学。进入清朝，黄宗羲用“浙

¹ **基金项目**：本文系2018年度宁波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“阳明心学与浙东文化研究”（YMXW18-6）阶段成果。

东学派”，章学诚用“浙东学术”，进一步明确化了“浙”即“浙东”。虽然，进入元明清以后，仍将浙江再划分浙东与浙西，有牵强之感，是学人的复古用法。20世纪以来，“浙学”才逐步扩大范围，涵盖全省。近几年，涵盖全省的“浙学”，才逐步抬头。总之，浙学，一开始就是“浙东之学”，也称为“浙中之学”，没有“全浙江之学”意思。今日所用“浙学”，内涵与外延明显扩大了。

2. 传统浙学及研究经历了类型的嬗变

在浙学或传统的浙东学派研究中，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概念与系谱争议。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认为清代浙东史学派与南宋浙东学派间没有关联性。言外之意，明代阳明心学不在此系谱之内。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浙江学人不管此种争议，编纂出了王凤贤、丁国顺《浙东学派研究》或管敏义主编的《浙东学术史》，似乎平息了这场挑战。最近又有学者抛出话题，东汉的王充不属浙学。浙学作为学派，始于南宋吕祖谦。此议影响虽不大，但有必要加以辨析。何以会有这种争论呢？这里的关键是没有区分“浙学”概念的类型与研究方式的转变。

一方面是传统儒学类型的转型。学，当然是学问或学术，此间的学术是学人做出来的学术成果。学问之学是个特指概念，是某朝的某种学问或学派。黄宗羲等人所说的“学术”，则是指知识体系。黄宗羲等人所说的“学派”，是指学脉（学术传承），而不是指学术群体。不同时代，学问不同，所以表现不同，有不同的特色。传统儒学，可粗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类型。汉学风格不同宋学，这正是王充不为宋元人提及的原因所在。

另一方面是浙学研究方式的转型。进入20世纪，浙学概念实际上实现了转型，由学问之学转而学科之学，学者们开始采用现代知识体系来考察浙江传统儒学发展史。今人所谓“浙学”，实际上是学科之“学”。学科之学是现代学术概念，在此视野下，浙学是学术专史。学术史意义上的浙学，实际上是“浙学史”，就是“浙地儒学史”，它是贯通浙江古今的学问或学派史。浙学史之所以能成立，值得后人大书特书，是因为串联不同朝代学人的内在逻辑是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两大要素。朱仲玉认为：“以地望为纽带联结不同时代学者的学术派别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学派中人必须都生于这一地区；二是学派中人必须具有大致相同的学术特色。”^②这里强调了籍贯与学术特色两条标准，学术特色就是“浙江特色儒学”。除了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外，更重要的是有基本的学术精神。浙东学术的精神是什么？不同时期以来，学者们作出过种种概括。近年比较流行的是创新或原创说，这样的表达基本准确。从今天来看浙学，浙学的基本精神是来自民间的、代表进步方向的学说。从国家思想与民间学术参照系数来看，浙学基本是一种民间学术思想，表现出民间学术的活跃性与先进性，不同时代的浙东学人，往往以救偏面目出现。儒学在中国两次成为国家思想，一是西汉时期，一是宋朝时期。而东汉与明朝，则是儒学作为国家思想的僵化时期，而浙江学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救偏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。从王充到吕祖谦，从杨简至王阳明，从刘宗周到黄宗羲，由全祖望到章学诚，甚至章太炎、蔡元培，浙东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时常是处于时代最前沿位置的。在汉学时代，它批汉学。在宋学时代，它批宋学。可以说，它是儒学革新者，是汉学的革新者，是宋学的革新者。浙东学派，是中国的浙东学派。一部中国学术史，离开了浙东学派，会大为逊色。在近代进化论思维指导下，浙东学术研究魅力一直四射，长盛不衰。学问之学，代不相同，有断裂，有传承。如此，浙江前后学人或学派间是否有内在学脉传承关系并不重要，王充有没有直接影响南宋吕祖谦、陈亮、叶适诸人，不是核心考量因素。前述争议的产生，正是因为将学科意义上的“浙学”当作了学问意义上的“浙学”。学科之学，则可以通过时空框架、浙地儒学、基本精神三大要素，将浙江历代学人或学派串联成一个知识谱系。如此，由学问之学至学科之学，浙学的定义与内涵已经实现了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。

用近代专题知识史眼光打量浙东之学，始于1993年出版的《浙东学术史》。此前的何炳松的《浙东学派溯源》，书名“浙东学派”，但正文混用，或称“浙东学术”，或称“浙东学派”。这不奇怪，章学诚所谓“浙东学术”，实际上即“浙东学派”。王凤贤《浙东学派研究》接续了何炳松的精神，重在“浙东学派”谱系建构。管敏义主编的《浙东学术史》，一开始使用的就是学术史概念，这是第一部用近代学术史概念建构浙东学人谱系之作，它的贡献在于较早地引进了汉唐浙东学术与晚清学术二章，在原来宋迄清代前期浙东学派谱系建构基础上，作了前后的延伸。

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，浙江学者越来越深入地讨论“浙学”及相关问题。有些学者采用了何炳松的观点，主张用“浙东学术”这个概念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。我们知道，历史上以钱塘江为界，浙江被分为“浙东”和“浙西”两大区域。今天的浙江省会杭州，就位于传统上所说的“浙西”地区。如果用“浙东学术”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，那么给人的印象是，今日浙江的文化中心杭州就被排斥在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思想”之外了。在此背景下，吴光等学者主张用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的“浙学”概念来表示“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”，或者说是“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”。根据这样的观点，东汉的王充自然应当被列入“浙学”系统。也就是说，在“浙东”概念没有形成的东汉时代，作为类型而不是学术史视野下的王充是不会受到关注的。

近年来，随着学术界对浙江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，“浙学”的概念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。有学者甚至将越文化、史前时代的河姆渡文化也纳入“浙学”的范畴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些学者坚持认为，“浙学”就是传统的“浙东学派”。他们主张，“浙学”是“作为一个学派、一种学术思潮的面貌出现的”。据此标准，“浙学真正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，是从南宋吕祖谦开始的”⁽³⁾。这样，东汉的王充就不应当列入“浙学”，因为“王充是充当了反儒的角色，南宋的理学家无不将他当作‘异端’看，怎么可能和他有传承关系？”至于越文化、河姆渡文化，更不能算作“浙学”，因为它们“跟孔、孟儒学更扯不上边”。

那么，如何看待上述争论呢？我认为，作为儒学学派的“浙学”，确实崛起于南宋；但学术史意义上的“浙学”，早在东汉就已经显露。汉唐时期，学在国家，学在家族，没有书院这样的民间教育与学术机构，不可能出现宋以后那样的学派竞争态势。王充既然是由浙江大地养育出来的学子，那么，他理应纳入“浙学”的谱系。而且，对于浙江的学术文化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认知。中国儒学经历了汉与宋两大阶段的剧变，宋学显然不同于汉学；21 世纪的浙江学术文化，更不同于古代。我们不能拿前人的认知，当作今人的认知。我们在构建当代浙江学术谱系时，更要放宽视野，不能局限于古人所打造的桎梏，否则就会作茧自缚。

简言之，就类型来说，王充无法列入浙学，但就学术史研究来说，王充必须列入。

3. 传统浙学及周边的观照

明确了传统浙学的时空与类型，就可以思考浙学及周边问题了。浙学及周边，可以是一个空间概念，也可以是一个学问类型概念。前者是一种区域横向研究，讨论的是不同区域的互相学习问题，浙学是在什么环境下发展的，又是如何影响周边学术的。浙学及周边，有两种联结关系，一是浙学对周边区域学术的影响，二是周边学术是如何影响浙学发展的，或浙学是如何从周边学术中获得营养成份的。后者关注的是学问类型间的影响，儒、道、佛三教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。

学人的成长，总离不开教育平台。古今成才平台条件稍异，早期的两汉是太学，中期的魏晋南北朝是家学，宋以后是官学(太学、府学、县学)，辅以书院。宋以后，能考上进士，得以到全国其他地方，是成才的一个因素。明清时代，到外地工作的士绅，最终都会回归故乡。至于没有机会外出的学人，只能在浙江各地小空间活动。统一的儒学教育平台，让他们的学问保持了儒学的全国统一性。同时，超大型国家又使之保持了一定的区域特性。有机会在大一统国家多地活动，学术就有机会扩大影响面。人走到哪，学术就影响到哪。

在东汉时代，王充的成才受到了洛阳太学的影响，也受到了淮南学人桓谭的影响。由于王充的活动空间不大，所以当时的实际影响有限。在南朝、隋间，天台宗的形成，是外地和尚智顓到浙江后生成的。天台宗后来还传播到了日本。南宋是特殊时段，当时首都在杭州，浙江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区，于是各地学人在浙江的交流也特别频繁。浙学的崛起，不是简单的地区交流，而是文化向首都区集聚的结果。元明清以后，全国政治中心重新北移。不过，由于民间重视教育，浙江仍保持了文化上的优势，出进士率居全国之首，知名学人的数量之多。阳明心学的形成，是阳明到贵州龙场驿反思后形成的。阳明到处讲学，故阳明心学在浙江、江西、贵州影响尤大。从王充至阳明，总的趋势是浙江学人的影响面在逐步扩大。由此说明，要实现学术的扩大，需要到不同地区讲学，在不同地区建立书院。否则，在古代中国，空间的限制是无法突破的。清代以后，浙东学人与其

他地方的交流更为频繁。章学诚虽是绍兴人，但随父亲宦居于外，一直在北方的湖北、顺天府、河南、安徽、河北、江苏等地活动，直到晚年才回到绍兴。邵晋涵一直在北京的朝廷任职，最后卒于北京。用今日工作户口在地化思维来理解，邵晋涵应是北京人了。可见，传统浙学史的建构，完全遵循的是浙籍学人谱系原则。

二、现代浙学：浙籍、浙地的学术建构

传统的浙东学派研究，研究对象偏重学派，章学诚以后，浙东学派已经衰弱，所以往往讲到清中叶就停顿了。《浙东学术史》根据学术专史理念，首次将晚清徐时栋诸人引入，一直讲到黄以周、孙诒让，这是一大突破。今日治浙学，根据学术专史理念，显然要进一步往下延伸，甚至可以延及当代，称为现代浙学或当代浙学。

1. 现代浙学的特点

20 世纪以来还有浙学吗？还能以浙江地域为中心建构学术谱系加以专题研究吗？可以肯定的是，传统浙学不再，但现代浙学仍在。有与没有，关键是看秉持的标准。如果承认浙学是浙籍学人之学，是建构起来的学术史，则肯定仍有浙学。不过，现代浙学会不同于传统的特点：

一则教育与学术类型的不同。民国以后，中国学术嬗变，向近代转型，更强调专业化。浙学由科举教育而科学教育，类型也会不同。儒学是综合性人文之学，科学是问题之学，是专题建构之学。

二则空间分布的不同。民国以来，中国学术面临空间发展状况的不同。进入 20 世纪，大一统国家的人才集聚效应更明确，一是向城市集聚，尤其是大都市。二是向高校研究院集聚，尤其是著名高校研究院。用学术地图眼光来分析学人出生与居住的地域性，是一个有趣的话题。

区域等级化。20 世纪以来，村向镇集中，镇向县集中，县向省集中。从全国来说，学者集中于北京与上海两大直辖市，浙江沦为次级区域。不参与全国学术交流活动，难以成为最优秀的人才。即使在浙江，杭州与宁波、金华、温州、湖州等地也有不同。

城市中心化。人才集中化，从乡村集中于城市。文化人多数在城市中，不再在乡村。城市与城市间发展水平也不同，小城市不如大都市，非省会城市不如省会城市。

教育的等级化。为什么某地盛产读书人，但又都在外面发展的？这与中国的大学体制有关。现代大学面向全国招生，好大学都在好城市，结果各地人才培养以后就留在各大城市。20 世纪以来，浙江学人在全国的影响面不小。有一个现象确实明确，民国舞台上，浙籍学人确实数量不少，影响不小。从浙江来说，温州出了不少学人，特别是史家多，当年的杭大历史系，多数是浙东人才。浙江中小学教育发达，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学术人才。浙东教育发达，这是有传统的。

单位等级化。城市又集中于大学与研究院。大学，成为各地学术文化中心。大学与研究院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高地。离开大学或研究院，难成大才。近代中国最优秀的学术人才，都居大城市名校之中。名校的竞争，让其人才不断往上走，从而有机会成为最优秀的人才。

人才等级化。因在不同城市不同单位，而导致学术水平的不同。宝塔效应更明显，县以下区域、非高校人才，完全难成大器。如果不在某城市的文化高地工作，没有好的平台，难以在学术上做出大的贡献，取得高水平学术成就。学术的高水平是在高平台竞争中产生的。能适应高平台竞争的，都是优秀人才。在全国性平台竞争成功者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。

学人在城化。20世纪前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乡村。20世纪以来，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城市。在新中国户籍制度影响下，人才普遍在地化，尤其是在城化，直接在不同城市落户。城市中的人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，城市史实际是移民史，城市主要是由移民构成的大社区。这样的结果，浙地人才出现四散化现象，近代浙学人才遍布全国，有了第二故乡。他们有了双重身份，籍贯是浙江，但居住在其他城市，户籍也属所在城市。外界之人更往往将之当作所在城市与所在大学的学人。只有故乡之人，经常会提及其籍贯。

可以说，20世纪中国教育与学术出现了城市化与学院化现象。基础教育发达与学术研究发达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由于以上诸多等级化，导致同样的学人，留在本地与到外地谋发展，其学术成就完全不同的现象。温州有“回头鹿”与“外面鹿”现象。在外面的人才发展空间大，而留在温州的人才发展空间相对较小。从空间上，温州偏处东南一隅，学术不发达。这个原理也可用于全浙江学人。

2. 民国以后的现代浙学如何研究

20世纪以来的近代学术研究，在中国各地大流动背景下，不再谈地域，而谈人物与学派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如何再关注地域，这是值得思考的。我们考虑更多的是浙籍因素，思考浙籍学人成功背后的浙江文化因素，思考浙籍学人在全国各地的成人与贡献情况。

现代浙学的内涵与外延，按传统的思维，至少包括两大部分，一是本地的浙学，二是外地的浙籍学人学术研究。两者相比，后者数量远远超越前者。如此，20世纪以来的浙学与周边，成为了人才的互相流通与学术的互相影响。浙籍人才向全国各地流通，同时，全国各地的人才也向浙江迁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术得以互相影响。

要研究现代浙籍名家，得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浙籍名人名单，然后加以谱系性的建构。同时，也要对浙江本地工作的学人名单加以梳理。目前，民国时期的浙籍学人，尚处于独立个人研究阶段。新中国的浙籍学人，则处于发展之中，信息分散，尚未进入研究视野。由此可知，以现代浙学为名的谱系建构工作，尚未提上议事日程。

近20年来，笔者一直关注晚清与民国的浙学研究。20世纪以来的浙学研究，应成为浙学的全新增长点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突破浙学研究的瓶颈。浙学研究，不能停留于传统浙学，必须向现代浙学推进。这样，浙学研究也才能更好地服务当下浙学的建设。

三、以温州史家董朴垞为例的研究

在现代学术中，浙地学人是如何在全国各地活动的？又是如何在浙江本地活动的？这些是值得思考的。拟通过尚未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野的温州学人董朴垞的研究，一窥民国浙学研究之全貌。

董朴垞(1902-1981)，温州瑞安人。1931年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，长期在厦门、杭州、温州的中学任教，1962年以浙江化工学院老师身份退休。⁽⁴⁾通过董朴垞的初步研究，可以让我们了解民国教育与学术的一些全新现象。

1. 教育的转型。

古代中国的教育是科举教育，须经官学的训练，才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。1905年以后，洋学堂成为主流。1912年进入民国时期，大学成为主流现象，学历的重要性凸显，学历成为读书人的全新追求。1922年，瑞安中学毕业后，董朴垞负笈杭城，考入浙江工专，由于专业与个性爱好不合，转学法政。1924年，后因病辍学，未能完成大学教育。除了正规教育，始终存在自学成才之路。如孙诒让一直未考上进士，但在父亲的引导下，自学成才，成为大家。董朴垞与孙诒让相比，家境差多了，但喜欢

读书治学，精神有相通之处。正规大学虽然未完成，但 1925 年始，他有机会给退休回到瑞安城中的洋状元、财政部次长项骧儿子当家庭老师。四年半的家教经历，让他有时间自学旧学。1929 年，他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，孙诒让私淑弟子的身份显然成为加分项，深得所长陈垣先生的认可。

2. 南北的交流。

到什么地方，跟谁在一起，是决定一个学人成才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。近代以后，人才间的交往全国化。瑞安大儒孙诒让引导他走上学术之路；与项骧的交往，让董朴垞心中有了一个北京梦。偶然的燕京大学招生广告，引导他来到北京，从而得以亲承陈垣、顾颉刚、张尔田的教导，这大大提升了董朴垞的眼光与学识。此外，同乡圈朋友也给他很大帮助。民国时期，温州人才济济，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温州籍著名学人夏鼐、周予同、孙孟晋、王季思、宋慈抱、夏承焘、孙正容、戴家祥、张慕骞均与他有交往，肯定他辛苦治史。

3. 由国学而史学。

民国学术总体特点是处于由国学而西学转型、由综合而专题转型期。虽然当时几所大学如清华、燕京、齐鲁、厦门均创办国学所，但实际上仍以专攻为主。这也说明，精通四部的难度较大。在国学向西学转型中，董朴垞较早地实现了转型，专攻史学。孙诒让擅长国学，他则擅长史学，这是他们不同之处。专攻史学，显然与导师影响有关。国学所的陈垣、张尔田、顾颉刚诸教授均擅长史学。此外，他受梁启超史学的影响相当大。这说明，现代专门学术对他的影响仍很大。不过，在写作上，他仍是传统的著书概念，而不是近代专题研究，说明他没有完全完成转型。由此证明了问题训练的重要性。科学探索是一种未知探索，问题是照亮未知黑暗的灯光，科学家思维是从问题入手的。面对眼前的未知黑暗，须靠问题之灯来照亮。有了问题之灯，人就会循着光线，一步步向前，层层追问下去，从而寻找到全新目标。问题意识弱，是传统学术的特点。当然，董朴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意识，至少会找选题、找材料，他存在的短板是专题分析的深度不足。三年研究生是严格的科班训练关键期。董朴垞存在的问题，可能是读研究生时间过短、训练不足所致，才读了一年半。不过，当时的中国学术整体环境也处于转型之中，没有完全实现转型，当时不少大学老师们也是如此。中国学术的真正起步是 80 年代以后的事，寿命长的人学术不断进展，而董朴垞则在 1981 年就退出了舞台。所以，不能用 80 年代以来的科研水平要求 30 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刚起步阶段的学人。

4. 工作平台对人的影响。

研究生教育，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人的研究方向与选题，培养出人的研究精神与能力。研究生毕业以后，他不太适应北方的生活，最终他选择了南归。董朴垞进入了中学工作。这份工作朋友、复旦教授周予同帮忙的结果。后来，遇到抗战与国内战争，越发困难。最后，连杭州也留不住，只能回归老家温州工作。1950 年以后，又遇上民国文史人员全员下岗、重新改造思想才可就职潮，董朴垞多少也受到影响，原来是高中国文老师，后来成为初中国文老师；原来是全职，后来一度半职。直到 1956 年，情况才有好转，得以在部属杭州化工学校任教。又遇到 1958 年高校下乡潮，他到了衢州化工学校任教。到 1962 年学校改为浙江化工学院时，他也退休了。董朴垞的可贵之处是，即使当了中学老师，仍执着于自己的研究方向与选题。不过，大学与中学的不同，乱世与治世的不同，所在城市的不同，均会对其学术产生影响。在中学治史，没有大学那样的学术环境，有其局限性。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，层次太低，不可能培养出弟子群，故董朴垞没有学术传人。所在城市，对学人的研究视野的关注有影响。乱世，让他居无定所，也影响其学术研究。董朴垞如果留在北京、上海高校任职，学术地位当更高。期间有两次找陈垣先生帮忙，然后终因方言与专题研究不足的限制，无法进北京的高校或研究所任职。他的主要学术资源在北京，北京的老师帮不上忙，无法在北京工作，自然难得大名，成为最优秀的学者。

5. 执着的学术追求。

1929-1931 年燕京大学国学所研究生班毕业的白寿彝、班书阁、张长弓、牟润孙、董朴垞五位研究生，后来均成为名家。其

余四位同学，多数在大学任教，中学任教是短期的事。相对说来，董朴垞担任中学国文老师长，大学教育时间短。不过，董朴垞一直保留了对科研兴趣与追求。1962年至1981年，退休20年，让他得完成作品的整理与研究。董氏的学术周期长，前后有近60年时间。夏鼐称他“白头穷史，著作等身”，史学成就实不逊色，惜因著作多未刊刻而不为当今学界所知。他有《中国史学史长编》《瑞安孙诒让学记》《中国正史编纂法》《中国史学史初稿》《俞曲园(樾)年谱》《王忠愍(国维)著述系年》《民国史稿》等学术专著，又有日记、文集等，共20种，现存17种，笔者将之编为《董朴垞全集》，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四、小结：何以要高扬浙学旗号？

今日为什么要再谈浙学？今日重谈浙学有什么现实意义？时代之问，来源于时代之需。当下中国正处于文化再建构的时代。在“文化浙江”建设活动走在全国前沿的时代，这种学科意义上的、包涵全浙江的“浙学”概念，显然更受地方领导与人民的欢迎。近年，浙江省社科联要想打“浙学”旗帜，将之当作浙江社科的品牌来建设，显然是借助海内外学术界认可的浙东学术、浙东学派品牌，以“亮点”带动“凡点”，推动整个浙江学术文化研究的发展。这是从浙江社科角度作出的战略思考，有提升浙江社科研究之意，想借此提升浙江学人在全国的位置与影响力。“传统浙学”和“现代浙学”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“浙学”，成为浙江的文脉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大亮点。

注释：

1 钱茂伟：《论浙学、浙东学术、浙东史学、浙东学派的概念嬗变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08年第11期。

2 朱仲玉：《试论金华学派的形成、学术特色及历史贡献》，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》1989年第4期。

3 张涌泉等：《新时代的浙学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17年11月11日。

4 有关董朴垞的生平，详见董朴垞《朴垞自订年谱》，董氏后裔藏手稿。